
韩素音自传

无 鸟 的 夏 天

(1938—1948)

陈尧光 黄育馥 张静尔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朱志焱

封面设计：钱月华

Han Suyin
Birdless Summer
Jonathan Cape London 1968

韩素音自传
无鸟的夏天

Wunlao de Xiatian

(1938—1948)

陈尧光 黄育馥 张静尔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9.375印张 136,000字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书号 11002·627 定价 1.50元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1
-------	---

第一章

魔影与幽灵	1
赫斯档案中的我	7
在回国的海轮上	13
一对怨偶的开端	18

第二章

堕落的“抗日堡垒”	28
到红十字会医院去工作	35
离开武汉的最后一条船	43
美丽的南岳，丑恶的人	48
军事会议内外	57

第三章

西去桂林的人流	65
目的地重庆	73
找到了成都老家的亲人	85
军阀混战中的四川	97

在大轰炸的日子里	101
--------------------	-----

从“前线”归来的保黄	109
----------------------	-----

第四章

第一本小说的来历	116
--------------------	-----

助产士的欢乐与痛苦	131
---------------------	-----

“读经班”中的人和事	137
----------------------	-----

难过的重庆炎夏	141
-------------------	-----

新四军事件与我	150
-------------------	-----

听周恩来演讲	156
------------------	-----

蓉梅——我的女儿	163
--------------------	-----

第五章

保黄出任伦敦武官	172
--------------------	-----

赴英途中当妈妈	175
-------------------	-----

在纽约初见美国	180
-------------------	-----

丈夫的目标与我的心事	185
----------------------	-----

第六章

英国朋友的情谊	202
-------------------	-----

从精神崩溃中振作起来	210
----------------------	-----

离家出走	219
----------------	-----

暂时和好	229
----------------	-----

第七章

重进医学院读书	238
-------------------	-----

从武官夫人到穷学生 · · · · ·	242
与过去的生活告别 · · · · ·	246
谢绝路易的遗赠 · · · · ·	252

第八章

保黄之死 · · · · ·	256
在英国人民中间 · · · · ·	267
献给女儿的爱 · · · · ·	270
终于当上了医生 · · · · ·	277
思念中国 飞回东方 · · · · ·	287

第一章

魔影与幽灵

一九六七年，我佇立在马赛卡奈比耶街头，重新回味着一九三八年站在此处那个淡漠，自私而且极端无知的二十多岁的少女罗莎莉·周的心情。当时，夹带着砂粒干燥的西北风扑击着我的脸，脸上挂着道道泪痕。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爆发之际，为此更加迫切需要作出抉择。今天，西北风又呼号着，在卡奈比耶街的拐角上，有一个新的开端正在兴起。岁月已把一九三八年我那古怪的泪水化成了可笑的细雨，成了对个人苦恼的嘲讽，而曾被泪水长久浸润过的脸，却变成了一面朦胧的玻璃窗。

然而当昔日的罗莎莉·周和今天的韩素音——在绵绵不尽的时光间隙中，佇立在马赛街头茫然不知所从时，一个魔影却在熙攘纷扰的大街上露了头。他是个身材高大，尖额钩鼻的中国人。他叫吴雷蒙，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是

我在布鲁塞尔大学的同学。从他谄媚的眼色中，我又一次看到了那内藏的凶险。他曾经连续七年在历次考试中没有及格过一次，可是却一直占着那份奖学金。我清楚地记得，他为了摆脱不学无术的困境，曾趋奉于另一方向的激进主义，把矛头针对我这个欧亚混血儿，当作它的天然靶子。

当他挤出前簇后拥的人群来到我跟前时，我并不感到意外。现在，凡是碰见在我自传中的人物，我都如此。两个月前我在美国讲学时，不也曾走进一家中国餐馆，迎面就碰上了餐馆的老板：一九三三年我在燕京大学的老同学罗勃特·庞吗？当年他也百般鼓吹爱国的大道理，现在却在蒙特雷这个小城，笑容可掬地向离开加利福尼亚兵营开赴越南的美国大兵端上中国饭菜。

吴雷蒙先开口：“一点儿不错，你就是罗莎莉·周，为什么又叫韩素音呢？”

“那是个笔名。”

“你真的回到中国去了吗？”

“是的，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没有把你怎么样吗？”

“没有。”

他不说话了，满腹猜疑。这该轮到我来问

他了。

“可是你，你没有回过中国吗？”

“我曾经考虑过好多次。”

“你讲过不少关于爱国主义啊，救国啊……”

“那时看起来是该等一下……情况很混乱……德国人侵入了比利时，德国在比利时的军事总督冯·法肯豪森把我们中国学生全撵走了……那是一九四〇年的事……有些人坐船回国了，我就来到了马赛……”

“这么说你近三十年来就呆在马赛了？”

“我现在是商人……我打算回到中国去访问一次……就在今年去……要是你能保证我回到马赛来，我就去。”

我眨了一下眼睛。“你真莫名其妙。这事得由中国政府来决定，谁也没法找什么门路。”

“要是你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在那边没有什么影响，你干什么要作有关中国的演讲？要是一点好处也没有，你为什么要……”

我发火了，掉头而去。很多人竟不懂得，人们的行为是出自个人的信念，而不是出于沽名钓誉或博取报酬，甚至连想获得同情和谅解的愿望都没有。一再碰到别人这种误解很使我沮丧。吴雷蒙

还跟着我走，他似乎发现我有虚可乘，径直奚落我。

“真是有胆量啊……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别人发表有关中国的演讲，在这儿并不受欢迎。……你要不是他们的人，你干什么把脖子伸得那么长？……”

他一直跟着我，鞋跟嗒碰在鹅卵石铺的路面上，在我身后发出笃笃的响声。“把你的住址告诉我……我要给你写信……”我没有理他，他这才走开去了。这时，昔日的忧伤重新激起新的苦楚，一起涌上心头。它随着我脚步的移动，迸发出阵阵强烈的创痛。

第二天，全城阳光普照，沐浴着一栋栋房屋的尖顶，也倾泻入一家家住宅的门庭。凛冽的北风从鹅卵石街道上回旋起来，把街旁的一些阳篷吹得上下扑动。树枝被海风吹弯了腰，倒向陆地一侧。

“那些主宰着你所梦想的的未来的人，他们并不需要你……那个未来不是你的，你是剥削阶级，这一点你无法改变……”“前进，前进，”风呼啸着。

另一位过去的幽灵又出现了，这次是在布鲁塞尔，是我到母校去作关于中国的演讲的时候。她叫蕾拉，原来是我的同学，一位共产党员，现在却

是个高雅的资产阶级。蕾拉曾经嘲笑过我政治上无知，责备过我不参加政治活动，怪怨我不投身于政治。“你是个胆小鬼！”今天，她却生活在蜗牛的软壳中。她直言不讳地批评我：“你在政治上太天真，”责备我在越南问题，中国问题，亚洲问题上都表了态。“必须要和平，这是最最重要的——我们不要战争……”我了解她所说的“我们”，并不是我所说的含意。她指的是生活富裕的人，我谈的是另外一些人。对蕾拉来说，只要她个人不被卷入，战争就不存在，那怕全世界在流血也罢。

蕾拉说：“我再也不上当了。”她曾在比利时被纳粹逮捕过，并在雷文斯布鲁克的集中营中呆过两年。她再也不愿提起那可怕的两年。很少人愿意谈自己在集中营中的情况，他们不想重温当年的恐怖景象。今天蕾拉又谴责了过去，她的新的领悟力真使我吃惊，现在她断言不卷入是对的，坚决的程度不亚于她在三十年前作相反的主张。

“你得明白，我在这个社会中生活，我依赖这个社会……政治上太活跃是不行的……何况现在的世界已经跟过去大不相同了……有了核武器，每个人最最重要的事就是少说话……”

也许有朝一日，我也会为自己找到少说话的

理由。我毕竟天生就不是个革命家。我胆小，信心不足，容易惊慌，不大愿意采取明确的立场，直到今天还没有加入什么党派。我简直不能设想自己会参加什么政党……但是我能辨别风向，听得见明天的风奏出的宏伟旋律。它告诉我——昨天的罗莎莉·周，今天的韩素音，必须重新作出抉择，走上旅途。

然而，我罗莎莉曾经期望，总有一天在旅程最后的终点（啊！旅行者，那是哪一段行程，目的地又在何方？），她会在一所房屋中得到安全，获得保障，找到满足。这所房屋，正是她在童年画过的那座有两扇大门的家。

今天我已经打开了这两扇大门，我知道它们是通往一个浩瀚的新天地的出口。在这两扇大门背后，既无栖身之所，又无藏身之地，没有围墙，没有门窗，连屋顶也没有，无法休息；只有海风，呼啸着它的旋律：前进，前进！谁也躲避不了。

虽然我知道，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错误累累，在多半命运的征途中，我走得气喘吁吁步履沉重；许许多多天赋比我高得多的人泄了气，陷入歧途。但是蕾拉，我只有一个回答：你精明设想的康庄大道虽然很好，然而你我都将在长夜中到达自己的

终点。你说我是在海洋中播种耕耘，你列举了那些死去的，被岁月消蚀而腐化的，或者象你这样聪明而深思熟虑地以为可以功成身退的人，但我将一往如前！因为我听到时代潮流奔腾的轰鸣。夏天的鸟儿不再四处躲藏，不再沉默，不再懒散了！

赫斯档案中的我

一份桔色的俗气的卷宗，夹着我于一九三八年九月搭乘法国邮船“让·拉包德”号从马赛驶往中国途中所写的那些信件。信中不免要回顾过去，收信人是当时看来唯一能了解我的约瑟夫·赫斯。他俨如父辈，又是我青年时代的良师益友。他曾替我安排妥当到比利时留学的奖学金，虽然他并不赞成。他曾给钱让我离开比利时，抛弃我的学业，我的外祖父，我的未婚夫，以及人人都预期我会得到的“锦绣前程”，而回到中国去。原因是中国在进行抗日战争，我不应置身事外。我必须回去。

当那份破旧的硬纸卷宗由赫斯的儿子在布鲁塞尔一个复活节的周末亲手交给我时，已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了。赫斯已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过世。他自一九〇五年首次抵达中国以来，曾为那家大

公司的利益辛辛苦苦地干了六十年。就在这位八十岁憔悴老人去世之前数星期，那家大公司在一次行政会议上客气地把他解了职，因为一个人到了他这样的年纪应该退休而靠积蓄过活了。“我失业了，又没有养老金——真不该活那么大的年纪。现在我靠卖书，卖古玩为生……我并无积蓄。”我现在还保存着那封叙述他如何被迫辞职满纸忿懣的信。我寄了些钱给他，他又向朋友们募集了一些钱。他在临终之前，在神志恍惚中，以为自己又回到了中国，他低声咕哝着说：“赶快，要不咱们就看不到日落了。”

赫斯的儿子给我的那个卷宗，是其他许多这类学生的卷宗之一。这些学生象我一样，都是由庚子赔款提供奖学金的。赫斯保留着我们的全部信件以及他的复信的抄件。

在卷宗的内封套里，插着一份打字的备忘录，日期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是赫斯自己写的。内容是我的生平的简历……但是概括得很奇怪，有很多错误和疏漏。

一九三四年，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刘瑞恒大夫对我说：“我办公室里有一位年轻的职

员罗莎莉·周小姐，非常聪明，……你能给她一笔奖学金吗？”

那是一九三二年，不是一九三四年，赫斯在北京圣迈可教堂的门口走廊上第一次见到我……为什么又把刘瑞恒大夫扯在里头呢？

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写这份自卫性的、辩解式的备忘录，而事实上又没有什么需要自卫的事情？写的时间为什么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而不在那时以前呢？我早知道他在考虑写他的自传，他说过，“我已经把一些事情串到一块儿了”，可是从来没有真正动笔写过，尽管他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笔记资料，包括他写给他母亲的信，从一九〇五年起直到她三十年代逝世为止，都收集在几个捆扎好的大纸夹子里面。

也许赫斯的动机无可非议。他感到应对我的一切遭遇负责，他想表白他自己。可是由于他觉得必须加强那种能令人肃然起敬的庄重姿态，我们之间全部理直气壮的争论和独特的纯精神的友谊，顿时变得可疑起来。这本关于我的备忘录中，通篇都是在日期和事实方面的令人费解的错误，那些说教似的段落，尽管象是甜言蜜语，却使生动

的故事听来难以置信了。

备忘录继续写道：

当时我同这位年轻姑娘和她的父亲作了一次谈话。她的父亲名叫周映彤，一八八六年生于中国的四川成都。他的妻子是比利时人。周映彤曾于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三年在比利时学习，成了工程师，然后携同妻子回到中国在铁路上供职。他的第一个职务——在陇海铁路上工作——是我替他介绍的。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大女儿渴望受高等教育，可是做父母的并不热心。他们要她嫁给北京美国大使馆里的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中士。

就这样，在最后一句中节略了我母亲对她三个女儿——忿怒的罗莎莉（就是我），可爱的蒂萨，美丽的玛丽安——的前途的期望。“一个美国人……那样你就可以舒适了……美国人都很有钱……”我回忆起母亲露出的笑容，露出了她那副牙齿已经脱落光秃的牙龈，她棕色的眼睛蒙上了一层欣然和安慰的神色，幻想着她的几个女儿嫁

给美国人的情景……今天我的母亲长眠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墓穴中，墓上的碑石并未镌刻我深沉的悲痛。当时没有这样做，是因为这位固执的女人即使死后也不肯饶人的。墓穴殡葬以及各种点缀的礼仪，都是我花的钱。只有现在，在他死了以后，我才能激发起一些对这位执拗的，悲惨的女人的亲子之情，并且感到我们之间厌恶的鸿沟，已为原应早就迸发的无所拘束的感情所填平。我开始心安理得地在自己身上发现了许多属于她的品质：顽强的体魄，固执的脾气……以及她的不少愚蠢。

这位年轻的周小姐却坚持要学习，最后她的父母同意了。

由于这位姑娘的中文还不好，她在燕京大学先呆了两年。一九三五年她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前往比利时。……

一九三八年，我又在布鲁塞尔遇到了她……她的学习成绩极为优秀，只是她正醉心于在中比友好协会主持下发表爱国的演讲。

我记得赫斯嘲笑过我：“你以为站在讲台上喋喋不休地讲一些老生常谈，就能制止战争吗？你对中国懂得些什么？你对战争又懂得些什么？”

三十年过去了，我又站在讲台上发表关于中国的演讲。我并不认为我能左右大局，可是我认为保持沉默是犯罪行为，对那些还能站出来讲话的人来说，保持沉默罪是无可宽恕的……

她想嫁给一个年轻的比利时律师，但是又考虑到她的责任是回到中国去。

就这样一句话，把路易撇开了。路易可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幽灵，因为他也参与了那些活动，他并没有保持沉默……

她在从马赛开往中国的船上认识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军官……他们在武汉结了婚……这桩婚姻也有喜有悲。还没有等她抵达中国，某些从欧洲回去的中国学生就已经对她议论开了。这使她很生气，她就给我们所有人都写了信，说是以后再也不跟我们来往了……